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杨 玲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杨玲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 杨玲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25-7687-6

I. ①先…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汉代③文化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④文化史—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I206.2②K203



单图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1897 号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杨玲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57,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7-5325-7687-6

I · 2934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兰州大学2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秦文化与甘肃”

目 录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试论《韩非子》散文结构对其美学思想的表现	003
嬴政青睐《韩非子·五蠹》和《孤愤》原因探析	011
从《诗经·秦风》看早期秦文化与甘肃的关系	025
论“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及晚唐诗歌中的 表现	037
浩浩其志通千古 ——《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052
《古诗十九首》反映的东汉文人心态的两重性 ——兼论《古诗十九首》“悲”之成因	064
霸王别姬：真实抑或虚假？	073
异曲而同工，同途而殊归 ——屈原与韩非之比较	078
智者 执者 达者 ——论古典诗文中“渔父”意象的形成	094
从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名、字、号与文集名看《楚辞》的传播与 接受	104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

- 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116
- 从秦代刻石文看秦始皇对先秦法家的接受与发展····· 133
- 理身如理国：历代赋中的“言医”叙写····· 150

先秦两汉文化研究

- 论先秦法家的学术渊源····· 163
- 齐、晋法家吏治思想比较····· 195
- 给法家一个公允的说法
- 从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和人治的比较看先秦法家的
- “以法治国”····· 215
- 法家：反智还是崇智？····· 229
- 试论经济观念对齐法家和三晋法家政治理念的影响····· 242
- 齐、晋法家君臣观比较····· 254
- 《管子》和《商君书》兵学思想比较····· 274
- 一篇研究先秦法家与秦关系的重要文献
- 《史记·李斯列传》····· 290
- 媒人探源····· 312

- 后记····· 321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试论《韩非子》散文结构对其美学思想的表现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先秦法家美学以注重实际和崇尚简约见长。这一美学思想不仅与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相辅相成,而且与其散文结构互为阐释,珠联璧合,形成先秦诸子美学中一道靓丽风景,值得我们细心品味,认真探究。

一

先秦法家是应时而生的学派。牟宗三先生说,同是针对周文疲弊的问题,儒家向立教方面发展,道家则变成玄理,虽然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但不切实际。而法家把周文疲弊视为一政治社会之客观问题来处理,故能切实际^①。从前期法家之商鞅到后期的集大成者韩非,有一个共同特点:反对虚无,崇尚实际。他们针对战国时代特点提出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着眼于现实,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现实。韩非抨击儒家仁义礼让治国论,反对墨家“兼爱”、“非攻”之说,并非只是基于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是因为它们在强凌弱、众暴寡、大并小的战国时期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以此治国,国将不国,君将不君,更遑论富国强兵、称霸诸侯。法家重实际的特点体现在治国理论中,也

^① 牟宗三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9—150 页。

体现在美学思想上,《韩非子》堪称代表。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羿也。……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李、惠、宋、墨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阔大非用也,故畏震车状皆鬼魅也。”韩非认为,人主听言如果不以实用为标准,游说者就会用一些华丽而不着边际的虚言浮辞欺骗之。人主对此“说(悦)而不禁”,国家将走向衰败。所以他主张把实用作为检验言行、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一标准下,无底的玉卮价值比不上有底的瓦卮。讴癸的歌声虽能使“行者止观,筑者不倦”,却如其师射稽让“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的歌声,因为讴癸唱歌时工人只筑了四版厚的墙,而射稽唱歌时工人却筑了八版厚的墙。检查墙的坚实程度,讴癸唱歌时筑的墙能捣进去五寸,射稽唱歌时候筑的墙则只能捣进去两寸^①。因此,从实用价值看,讴癸的歌声显然不如射稽的歌声。通常人们认为这则寓言说明韩非对艺术的态度着眼于纯功利,而忽略人的正当审美需求。不可否认这一倾向的存在,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故事发生的前提:“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此种情形下,保住国家社稷是第一位的,因此武宫的坚固与歌声的动听相比,前者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韩非说:“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②在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每个诸侯国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使国家富裕、强大的策略,摆脱被吞并的命运。正如韩非反驳孔子关于“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关系时所说:“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

①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外储说左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五蠹》。

暇待万世之利?”^①当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不存在时,美的意义又如何体现?对一个失去家国的人来说,即使惊心动魄的美展现在眼前也无心欣赏,这是人人都懂的浅显道理。从这一点来说,韩非以实用为美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

韩非美学思想的另一特点是崇尚质朴、简约,反对以文辞和修饰为中心的形式之美。

韩非不是简单地否定形式之美,这点从他对文与质的关系和礼的认识上即可看出。《外储说左上》篇,楚王问田鸠:“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田鸠说:“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②“以文害用”这是韩非反对文辞和修饰的真正原因。由此也知他并非一味地、单纯地反对文辞、修饰。韩非说:“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③可见他也承认、肯定修饰的作用。只是这一肯定有条件限制:修饰必须增加被修饰主体的价值而不是喧宾夺主,使人们因修饰而忽略了主体自身的价值,以至主次颠倒,犯了卖珠的楚人和嫁女的秦伯的错误^④。所以当文之于质有害无益时,当修饰削弱、甚至否定了被修饰主体自身价值时,韩非对它们由肯定转而反对、否定。

韩非对文辞和修饰的认识与他的法家学说相辅相成。韩非深知,尽管法家思想是治国的最佳指导思想,但是要让君主接受却并

①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难一》。

②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外储说左上》。

③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显学》。

④ 楚人要卖珠,但因为给珠子做了一个非常漂亮且贵重的盒子——“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以至于“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秦伯嫁女儿,把陪嫁的侍妾装扮得比自己的女儿还漂亮,以至于“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两故事详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不容易。即使接受了,因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当途之人”的利益,遇到的阻力非常大。而于治国无益的学说却往往用华丽的形式迷惑君主,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亡国之路。这是让韩非痛恨不已的事情。于是,他对以文害质、单纯追求形式之美的行为、现象给予毫不留情地激烈批判和抨击,以至给人们留下否定一切形式之美的印象,这实在是一种误会。而他对礼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误会。

通常人们都以为韩非反对礼、否定礼,但实际上他反对的是以虚假形式掩饰真情的礼。韩非虽然主张“一断于法”,但其法治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目的是建立君主专制,因此继承和借鉴儒家之礼是情理中事。特别是对君臣之礼,韩非不但不反对,而且大力提倡。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评价法家“若尊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①就证明了这一点。韩非说:“礼者,所以貌情也。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②肯定了礼是人之内心情感的自然表现。但是同时他又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毋需装饰,因为“其质至美。物不足于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把这一观点延伸至礼的范畴,韩非提出“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故曰:‘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④。在韩非看来,真正深厚的感情不需要礼来表白,如父子之情。内质美好的事物毋需修饰,事物如有修饰的需要,反衬出的就是其内在质的不足和虚弱。这似乎又在说韩非

① 汉·司马迁著《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解老》。

③ 同上。

④ 同上。

是反礼的。到底该怎样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和对文辞、修饰的认识一样，韩非不是简单地否定礼，他否定的是繁琐的、流于形式的礼。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人们一方面在破坏旧有的礼制，另一方面又虚伪地维持礼的形式。作为礼的内涵的礼义被弃置一边，作为形式的礼仪却日趋复杂、繁琐，人们似乎想通过礼之仪式的繁琐弥补其内涵的缺失。对此，倡导礼的儒家先祖孔子也表示不满。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①韩非之反礼正是针对此而言，所以他说：“礼繁者实心衰也”，“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韩非对礼的认识进一步证明韩非对文辞、修饰等形式之美的态度：反对过度追求，一定程度上给予肯定。简约、质朴正符合了这一要求，故成为其美学思想的又一特点。

二

实用、简约是韩非美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实用须以简约为手段。如果实用却拖沓累赘，其美学价值将大打折扣；简约须以实用为前提。简约却无所用，简约就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依据。实用、简约的美学思想处处表现在韩非散文中。比如文章题目多用数字，《二柄》《八奸》《八经》《三守》《十过》等。《二柄》就是君主统治国家必需的两种手段：刑、德；《八奸》讨论了危害君主和国家的八类奸邪之臣；《三守》论述君主保护自身的三种手段。每个题目都简洁明了，不故弄玄虚。论述过程中，韩非一样喜欢用数字，一、二、三、四分门别类，有条不紊，非常清晰。实用、简洁的美学思想在其散文结构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① 杨伯峻编撰《论语译注·八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文学作品的结构是指“文学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和总体安排”^①，它的本质是以一统多，“作者从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审美理想出发，将分散的文学材料熔铸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②。因此，结构常常体现着作者对美的理解。先秦诸子散文发展前期主要以语录体为主，简洁是其特点，有时寥寥数语即构成一篇文章，所以尚未深入涉及作品结构问题。及至战国末期，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散文反映的内容随之增加，如何把庞杂的材料熔铸成结构紧凑的文章是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韩非在汲取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创制了与其法家思想吻合的散文结构，形成一篇篇在古代散文史上影响久远的长篇巨帙。

并列式和总分式是韩非散文结构的主体。并列式指文章由若干个对等的部分组成，其间没有任何起承转合的文字，所有内容由一条隐含的主线——法家思想将其联系在一起，形散而神不散，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此类结构以《难》四篇为代表。

“难”作为一种议论文体式，首创于韩非。其基本格式是作者先提出一种观点，然后以此为的予以批判反驳，在反驳中阐述、树立自己的观点。《韩非子》中有“难”体散文四篇，每一篇都有若干章驳论组成。对于整篇文章而言，这些驳论的地位是等同的，没有轻重主次之分。驳论与驳论之间也没有起承转合的词语或句子，乍看似乎是随意放在一起的，实际不然，它们表现着一个共同的主题——韩非的法术势思想。如《难二》共由七章驳论组成，第一章借晏子谏齐景公“止多刑”说明，法律的实施关键在于是否得当，而在多与少。第二章借批评齐桓公为消除遗冠之耻而“发仓困赐贫穷，论圉圉出薄罪”的做法阐明“赏无功”、“不诛过”不仅不能雪耻，而且是“乱之本”。其他五章也均是从不同角度入手宣扬法家

① 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9 页。

② 同上书，第 190 页。

的以法治国思想。

在并列式结构的散文中,《亡征》是一篇奇文。文章列举了将会导致覆国亡君的 47 种做法,47 种做法被韩非用 47 个以“可亡也”结尾的句子简炼地概括出来,并列平行地组合在一起,气势宏大,震撼人心。读之,一个接一个“可亡也”“可亡也”扑面而来,仿佛杀身之祸就在眼前,令人不由得悚然惊觉。郭沫若先生评价此文可以和屈子的《天问》媲美^①。除此之外,用并列式结构的还有《解老》《喻老》《八经》等篇章。而在一些非并列式的篇章中,韩非也往往穿插大段的并列相承式文字,如《难言》中对各种进言方式弊端的描述,《说难》中对游说之难的分析等。由此可见韩非对并列式的青睐。

总分式是韩非散文的另一重要结构方式。“总”就是文章的主旨,“分”是对主旨的阐释和发明。如《十过》,开首便点出文章主旨,即君主容易犯的 10 种过错及其危害。接着用唇亡齿寒、濮上之音、重耳灭曹等 10 个寓言或历史故事分别进行阐释。《韩非子》中有《储说》6 篇,可谓总分结构的代表。如《内储说上——七术》,开篇点题:“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惩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智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这是全文的总纲。接着有 7 小段并列文字对“七术”分别作初步地解释。如“众端参观”: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

①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9 页。

这一段文字相对总纲来说是“说”，相对下文的“说”而言则又是“经”。“经”多使用对偶修辞手法，富于节奏，朗朗上口，便于记诵。“说”多为故事，趣味横生，帮助人们理解“经”所述道理。如果把总分结构比喻成一颗大树，那么“总”——文章的主旨，是大树的本根，“分”——对主旨的解说，是大树繁茂的枝叶。根为枝叶提供营养，枝叶表现着根的活力，二者缺一不可。

并列式和总分式结构形式上虽有不同，其实质却一样。二者都是通过主旨把零散的材料熔铸成一个整体，使其从不同角度表现主旨。唯一不同的是并列式结构中文章的主旨是隐含的，而总分式结构的主旨是点明的。刘勰《文心雕龙·附会》对两种结构的特点做了形象概述：“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并驾齐驱，而一轂统辐，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辔而已。”韩非之选择并列式和总分式作为其散文结构的主体正反映了他崇尚实用、简约的美学思想。这两种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容量大。无论并列式还是总分式，围绕或暗或明的文章主旨，作者可以恣意挥洒，尽情铺排，毋需顾虑作为形式的结构是否能够容纳丰富的内容。其次，文章可长可短，不必拘泥于一定之规。正如刘勰所说“去留随心，修短在手”。最后，这两种散文结构具有简约明了的特点。文章的主旨如一条线把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中间不夹杂任何任何转承文字，干脆、简洁，不拖泥带水，却又不失紧凑。

综上所述，韩非散文结构实践着他的美学思想，是美学思想的变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使其散文在内容和形式实现了了和谐统一，从而形成了一篇篇文采斐然、内容充实的古典散文佳作。

嬴政青睐《韩非子·五蠹》和《孤愤》原因探析

说到秦始皇与先秦法家的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与韩非之间因《孤愤》、《五蠹》引起的恩怨是非。这一读者与作者的遇合故事是那么引人注目，以至于千百年以下依然被津津乐道^①，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它则是研究秦始皇与先秦法家关系的一把钥匙。

一、嬴政读到的是《孤愤》、《五蠹》还是《储说》系列？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闻此言答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于是嬴政立命攻韩。韩王无奈之下只好派韩非作为使节前往秦国。这一去韩非再没有回来。

为两篇文章发动一场战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绝无仅有。无论信奉儒家的“君子”们怎么批判诋毁韩非，这一独属于他的荣耀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遗憾的是崇拜者和被同崇拜者相见后，这

^① 除下文所引晋代葛洪、南朝梁刘勰言之外，清代文学家和考据学家王谟也曾说：“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懽气发于内也。”（王利器《新语校注·附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11—212 页）